

凭借“两通”起飞，把武汉建设成为 “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

李 崇 淮

自从开展对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探讨以来，历时已数月。在此期间，听到不少高论，也读到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对自己很有启发和帮助。它们提高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现将我和部分同志对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设想重新表达如下：

从地处全国交通中心的地位出发，凭借加强交通(包括运输和电讯)和流通(包括商流、物流、钱流和信息流)(简称“两通”)两翼起飞，把武汉市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或“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这里经济中心的含义包括交通运输中心、内地贸易中心、对外经济贸易中心、工业基地、农村产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以及信息、咨询和管理服务中心等等，亦即多功能中心之意)，以此带动并促进武汉地区、湖北地区以及内地有关各省经济的全面和迅速的发展。

制定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主要应该考虑：(1)所依据的条件，亦即这个地区的特点和优势；(2)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3)达到这个目标所应采取的主要手段或途径。现就这些方面试予说明如下。

一、武汉的特点和优势

武汉能够成为较广大地区的经济中心所具备的条件很多，主要有：

(一)武汉地理位置适中，长江横贯东西，京广铁路纵穿南北，水陆空运四通八达，是我国内地最大的交通运输中心。

在水运方面，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和汉水的入江口。以长江、汉水为主的航运水系，连接我国中部的江河湖泊，构成一个庞大的水运网，从武汉由长江东去上海1,125公里，全年可通航五千吨轮船，盛水季节，可通万吨轮船。由长江西去重庆1,375公里，全年可通航二千五百吨轮船，洪水期可上达宜宾。从武汉溯江而上，经洞庭湖可通湘、资、沅、澧诸水；顺江而下，可经赣、皖、苏三省通达鄱阳湖、巢湖和太湖区域。沿汉水北上，可通往陕西并连接丹江等支流。小型客货轮可抵襄樊；小拖轮可达光化。湖北省内有河流214条，长年木船里程可达六千公里，通航城镇有30个。

铁路方面，京广线北可通华北、东北各省，直达我国北部与东北边陲。该线北与陇海、兰新相连，可西达乌鲁木齐，东达连云港；南通广州、深圳；西南与湘桂路线相接，可达南宁、湛江。汉丹线直指西北。与焦枝、襄渝和阳安线相接，可通川、陕、云、贵各省。省内武(汉)大(冶)线正在延建至江西沙河街，将与湘赣路和鹰厦路相连，这样就可直抵我国东南隅的福州和厦门。

公路方面，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境内已形成稠密的公路网。出入武汉的主要干道有5条，可通向豫、皖、赣、川、湘等省。空运方面，有省内外航线9条，过境航线8条，由武汉可以直达国内各大中心城市。

由此可见，武汉的交通，真可说是四通八达。历史上湖南、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土特产多从水路运到武汉集散，故有“九省通衢”之称。现在加上铁路、公路，直接通达的地方已远远不止九省，十几省都有；加上间接联运，在国内可说无所不至。

这是武汉能够成为经济中心的最重要的条件。在看到童大林同志关于全国总战略设想(“东靠西移，南北对流”)以后，感到武汉正处于这个战略设想的“十”字中心，亦即南北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和东西水路大动脉(长江)的交叉点。这个特点正是武汉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不管今后全国的发展战略怎样制定，这个特

点和优势总是改变不了的。其他条件，国内有些其他大城市也有，唯独这一特点任何中心无法代替。即使没有其它条件，仅凭这一点，武汉就能成为一个大的经济中心。不过，由于过去对水运和港口建设不够重视，铁路，公路车辆不敷需要。这种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二)商业基础较好，历史上早就是我国内地的贸易中心。由于武汉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因而很早就成为我国贸易重地。远在三国时代，夏口(即今汉口)和石阳(即今汉阳)就见经传。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和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十九世纪中叶，汉口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商业更趋发达。本世纪初，汉口贸易额曾一度超过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三十年代，武汉对内贸易额仍居第二位，但对外贸易额则降至第五位，内外贸易总额居第三位。1936年全市货物吞吐量曾达两千万吨。当时不仅内地各省大宗的土特产品要先集中到武汉再行转销其他各地，而且大量出口农村产品也是通过武汉直接运销出去。如1936年从汉口输出的石膏占全国99%，桐油占80%，棉花和铁矿砂各占40%，茶叶占34.6%，猪鬃占16.4%。当时武汉商界在商品流通渠道、商情信息，运销批零、输出输入、加工整理、仓储装运、报关纳税和金融通等方面都曾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忽视了商品流通和不能直接对外贸易，加之经济管理体制上的毛病。武汉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方便，市场广阔，经验丰富，信息灵通等因素，武汉对内对外开展贸易的潜力很大。

(三)工业方面拥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建国三十多年来，武汉市已经形成了以钢铁、机械、纺织为主，轻工、化工、电子、建材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的工业基础。全市工业企业有3,381个。1982年底，在全国二十五个大中城市中，武汉市工农业产值仅次于京、津、沪居第四位；冶金工业居全国第三位；纺织工业是全国五大纺织中心之一；机床拥有量居第五位，还有具有七十年代现代化的武钢一米七轧机，工业生产潜力很大。但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技术设备落后、更新改造缺乏资金、经营管理不善以及市场阻塞、原材料供应不上和产品销路不畅等原因，不少企业设备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不高。

(四)高等学校、科研、设计机构比较集中，专业比较齐全，智力基础雄厚。武汉现有高等院校二十七所，拥有正副教授两千多人，仅次于北京、上海，在全国大城市中居第三位。现有市以上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一百三十多所，科研人员约一万二千人，其中正副研究员近五百人，在全国大城市中居第三位。全地区科技和工程人员有两万多个。这种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如果很好地组织起来，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五)水电能源丰富。在武汉市以西的四百公里范围内可开发的电力资源有两千万瓩。其中葛州坝1,600万瓩，丹江口150万瓩，清江250万瓩。现代各种产业的开发，都要用电能，特别是工业。有了丰富的水电资源，对经济的发展自然有很大好处。这种水电能源虽不在武汉市区以内，但“近水楼台先得月”，这种优势是国内其他大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以上是使武汉能够成为华中地区经济中心的主要条件和优势。尽管这些优势还没充分发挥，但它们的存在已经使武汉成为附近地区的或大或小的经济中心了。不过这个中心还不是我们所要求的那样的经济中心，它的作用也还没有充分发挥罢了。

二、关于战略目标的选择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武汉建成为一个经济中心，这是没有多大争论的。如果不把建成一定规模的经济中心作为战略目标而只把奋斗目标局限于武汉本身的经济发展的话，它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将是很有有限的，必须使武汉经济发展能够带动和促进有关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使武汉在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中和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中充分发挥作用。

但是，仅仅提把武汉建成为一个经济中心是不够的。经济中心有大有小。前面说过，武汉本来已经或多或少是一个经济中心了，不管你承不承认它。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也是、或将成为有关地区的经济中心。单提经济中心还不够说明武汉作为经济中心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经济中心的特点和优势，因此有必要在战略目标中把这个经济中心的特征和规模表达出来。这样可以更鲜明地说明它的奋斗目标。

在讨论中，关于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法有好几种：如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立足武汉，面向湖北，

面向农村，占稳脚根、辐射发展；面向内地、通畅江海；和以工为主，带动商交等等。我反复考虑，认为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比较切实可行。但若提“内联九省，外通海洋”则气魄更大一些，更能反映武汉的特点，理由是：

(一)它们突出了武汉地处华中和作为“九省通衢”的历史特点。华中包括哪几省、是否可以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和安徽，可以研究。九省原来指的是：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现在已经不止这九省，湖北省是武汉的所在地，当然更应包括在“内联”之内。这里，所谓“九省”不过是形象化地说明大致“内联”的范围，不是把“九省”严格都划归依托武汉所形成的经济区的意。实际上“内联”的范围可以大于九省，也可以小于九省，视将来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定。经济活动不会也不应该有一个边界线。建立经济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按经济活动的规律办事，建成合理的经济网络。如果固守着一个划定的“边界线”，又会形成新的块块了。甚至我国将来形成了以各大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我也不赞成有什么严格的分界线，使经济活动不能相互交叉、渗透。这样是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的。

(二)湖北和内地其他各省的生产主要是农业，但不完全是农业。“内联华中”或“内联九省”包含“面向湖北”、“面向农村”、“面向内地”的意义在内。但内涵更广泛一些。如各省的林、牧、副、渔、工业、科技等等的发展也都在“内联”之内。

(三)“外通海洋”，在沿海城市不足为奇，但就内地城市来说，能直通外洋的就不多见。特别是地处内地的中心城市，可说只有武汉。武汉在解放前就是对外贸易港口。1980年国家已批准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今后如果把港口修好，万吨轮直通外洋，就能使武汉成为华中或内地九省对外贸易和对外进行经济联系的中心。过去必须集中在上海和其他口岸对外贸易的物品和经济联系就会有一部分转移到武汉来，因为这样会使运输费用和时间要节约得多。这样既可以减轻上海和其他口岸的负担，又可大大发挥武汉内联九省的作用。

“内联华中、外通海洋”和“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提法都比较具体，又能反映武汉的特点和优势，后者更能体现武汉市作为一个特大中心城市的雄伟气概。

为此，这里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目标：“内联华中、外通海洋”或“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前者可说是“低目标”，后者可说是“高目标”。何者恰当，请大家考虑。

我曾提出要把武汉建设成为“东方的芝加哥”。这不过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意在使它成为我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而且武汉在地理位置上和经济中的作用同芝加哥也有类似之处。

三、为什么要凭借“两通”起飞？

关于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所要采取的主要手段或途径，我原来的提法是“从加强交通运输条件入手，大力发展商业，……”或“从交通和商业入手，……”。有人把这说成是“以两通(交通和流通)为两翼起飞”。我看这个提法好。把“两通”看成两翼，凭借这两翼带动整个经济起飞，更形象化，更能说明两翼与主体(经济)的关系。经济主要是生产活动。我们说，凭两翼起飞，并不是说只飞两翼，主体就不动了。一个鸟儿，如果两翼飞起，主体就不动吗？主体不动，鸟儿是飞不起来的。我们强调从“两通”入手，有人发生误会，以为我们主张“脱离工业生产发展而单纯发展贸易”。有人强调，应“首先使工业站稳脚根，增强市属工业实力”。我不反对“要使工业站稳脚根”，也不反对“增强市属工业实力”，而且认为，在加强“两通”的同时，应该这样做。我们要搞好“两通”，正是为工业大发展开辟道路。问题是：我们应以“两通”为鸟翼呢？还是以工业为翅膀？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实际问题，一是理论问题。就实际问题来说，这是同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相联系的。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就武汉本身的发展来说，我赞成把工业的整顿和改革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单纯为了建设武汉，而是把武汉建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和它所联系的地区是互相依存的。没有其所联系的地区，就无所谓中心。没有中心这个地区就是一盘散沙，成不了一个经济区。中心和其所联系的地区之间必定要有一定的纽带，地区的各点之间也要有一定的纽带，这样，才能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网络，否则商品、物资、信息和货币在中心城市和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就流通不起来。而这种纽带只能靠交通和商业。前者提供流通的渠道，后者提供流通的组织者，两者缺一不可。在这方面，工业是无能为力的。工业生产的東西再多，没有“两通”，是流不到所需要的地

方去的。

我曾把经济中心比作有关地区的心脏。心脏的作用主要是掌管全身的血液流通。交通运输条件就是血管，商品流通就是血液循环。没有血管和血液流通，心脏发挥不了作用。同样，没有“两通”，中心城市也发挥不了经济中心的作用。因此，“两通”是一个城市能够成为有关地区经济中心的首要条件。经济中心首先是“两通”的中心。一个城市，可以没有大工业而仍然能够成为有关地区的经济中心。但若没有“两通”，它就形成不了有关地区的经济中心。我还认为：一个城市能够成为多大的经济中心，或这个经济中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就要看它“两通”的条件何如。“两通”条件差，它的作用就小；“两通”条件好，它的作用就大。武汉不是没有“两通”。有，不过“两通”的潜力还没有很好的发挥，所以需要加强。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武汉，也适用于其他中心城市。不妨说，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也就是说，凡是经济中心，都应该搞好“两通”。这是作为经济中心所在地区这样的系统来说的。就全国这个大系统来说，也是如此，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两通”很不重视，因此欠账很多。前一段武汉市曾经缺煤，严重影响生产，就是运输不畅的缘故。现在我们的政府把加强交通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也要改革商品流通体制，作为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完全正确的。

就理论来说，这里牵涉到建国以来，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就是生产和流通的关系问题、或工业与商业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是否仍然是商品生产，包括生产资料在内，这一点，建国以来，长期存在着不同看法，现在算是解决了。但对商品的特点，似乎还有些认识不足。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它与直接分配的产品不同。它要通过流通环节才能到达使用者手中，也要通过流通环节来实现它的价值。如果一个工厂，它所需要的原材料买不进来，它的再生产就会停顿。如果它的产品卖不出去，产品价值不能实现，没有资金购买原材料或发付工资，它的再生产也无法进行。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过程，就是生产与流通相互交错的过程（其他环节这里略而不论）。生产决定流通、工业决定商业，但流通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商业又反过来影响工业。它们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生产愈发达，分工愈细，协作愈强，对流通和商业的要求也愈高。或者说，生产越发展，工业门类越多，交换越频繁，流通就越要通畅，商业就越发达。生产和流通，工业和商业，应该齐头并进，才能使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但是，过去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只是一再强调生产、生产、再生产、不顾社会的需要，对流通很不重视。重要的生产资料是直接分配，而不进入流通。从事商业，低人一等。有些人甚至一度把商业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地方对商业机构大砍，特砍加上过去强调集中统一，强调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政企不分，条块争夺，把具有有机联系的社会大生产分割得支离破碎。就流通领域来说，就形成机构重叠，婆婆多，层次多，环节多，人为障碍壁垒多和批零机构少，流通渠道少以及商品流向不合理（如迂回运输、反向运输和曲线运输）等现象。1934年武汉市有批发商栈2,075户，解放初降为1,384户，目前全市批发网点只有160多户了，而全市人口却增加了好几倍，这种情况显然不相适应。由于“两通”阻滞，产供销脱节，货流不畅。许多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供应不上，设备更新改造困难、产品积压卖不出去，造成停工待料、开工不足、设备利用率不高等现象。过去武汉市工业生产经济效益不高，除去管理体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不善、技术设备落后以及“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等原因外，“两通”不畅也是重要原因。总之，过去“两通”不是过头，而是不足，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使“两通”的发展赶上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让它们拖住生产发展的后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要凭加强“两通”来使武汉经济起飞的理由。

四、十二条战略措施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首先要发展“两通”，但仅仅是发展“两通”，是不够的，还必须配合其他重要战略措施。现根据讨论过程出现的建议，结合我个人的想法，提出以下战略措施，以供切磋：

（一）加强交通运输条件。武汉地区的铁路、公路的基础比较好、今后主要是增加车辆和管理。希望中央赶快把武大线和浙赣线联接起来。现在应该加强的重点是水运，充分利用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和江河湖泊舟楫之便。运输费用是各行各业的重要成本。一般来说，航空与公路的运输成本最高，次为铁路，水运最廉。长江是我国水运的大动脉，有中国的地中海之称。长江如果加以整治，运输量可以抵得上十四条、甚至二十条

铁路的运输量，而且运输成本低得多。但过去这个“金色的航道”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汉水和内地湖泊河流的运输也没有得到发展。今后发展水运的主要措施应该是：（1）希望中央尽快地把汉口下面的阳逻附近的深水港建好，必要时可以利用外资，使之能够停泊和装卸万吨以上的海轮。还要把码头、仓库、装卸（要推广集装箱运输）和搬运等设备搞好，并把铁路支线修到那里。这样，今后部分的海外运输可以不经上海或广州转口，而直接在武汉装运或卸货。（2）整治长江航道，特别是汉口到阳逻的一段。据说经过整治可容纳四条船同时并行。整治以后，两岸土地还可加以利用。（3）大力发展造船事业。建造大量可以在内地江河湖泊航行的小机动运输船和江轮，还可建造海洋轮。小船可以从事省内外和两湖地区内河和湖泊的运输，江轮可以上溯重庆、宜宾，下达南京、上海。海轮至少能以航行到香港或日本为目标。

此外，还须修建国际机场，把武汉建成国内航空和国际航空的一个中心。邮电通讯事业也要大力发展，尽量采用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这是信息传递的主要渠道。信息的迅速传递，对提高各行各业的经济效益有很大的作用。要使武汉成为一个有效的经济中心，必须在其所属经济区内建立起信息网，而邮电通讯工具就是建立信息网的必要条件。

（二）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商业，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要打破条条块块的束缚，在经济区内组织商品流通网络，建立一个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并存的少环节、开放式的商品流通体制。所谓多种经济形式，即不局限于通常所讲的国营、集体、个体的三种形式，也可以是各种经济形式相互结合和交叉的形式，如国营之间、集体之间的联营、国营同集体以至个体的联营，还有集体和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联营等等。不同部门的企业也可联营，如工商联营、农商联营、商商联营和农工商联营等等。经营方式也要改变过去那种固定行政供应区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批发倒扣作价率，固定批零起点和零售服务环节的单一进货方式，单一销售方式，单一服务方式等做法，允许灵活多样。允许成立从事多种商品贸易和单一商品贸易的，从事远距离营销的和近距离营销的，从事批发的和零售的，还有专门从事仓储、保管和运输的各种商业组织。特别要发展从事内地农村产品和土特产品的收购组织和从事异地贸易的行商。只要不是投机倒把、经过合法手续注册、服从管理并纳税的都可经营。还可兴建贸易中心大楼，组织各种商行、货栈、合股公司、行会、交易所、信托公司、商品展销会、博览会等等。总之，要在国营商业领导下，采取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来便利商品流通，把商业搞活，使武汉能够真正为华中地区、甚至“九省”的物资集散中心；而且在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也能货畅其流。

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各种对外贸易公司以及与外商、侨商进行合作投资、加工订货和补偿贸易等各种经济组织，以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联系。一方面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一方面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关键设备以加快武汉市的、湖北省的和内地其他各省的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使武汉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一个重要口岸。这样，不仅华中各省、甚至西北、西南各省的出口物资都可以通过武汉直接转运出去。这些地区向国外购进的机器和技术设备以及其他物品也能由国外直接运到武汉再转运到内地。这样，武汉对内地各省的作用就更大了。

以上不完全是武汉市本市的力量所能解决的，需要在中央和湖北大力支持下进行。

（三）实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网络。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主要弊端是权力集中过多，条块分割和政企不分，以致不能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这不仅在商业上如此，在工业、计划和财政等方面也是如此。比如，武汉工业企业中相当一部分为中央和省属企业，武汉市管不着。武汉市属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占全部固定资产总值还不到三分之一。武汉市机械工业有1,141户，拥有固定资金（原值）23亿元，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四分之一以上，可说具有一定规模，但纵向分别隶属40多个系统和部门，横向分属中央、省、市、区、街道五级行政领导，纵横交错互不联系，设备利用率低，一般只达30%左右，造成很大浪费。现行计划体制是按行政组织管理经济，省辖市只不过是块块的一个点，在计划体制上基本上与地、县处于同等地位，经济建设由国家安排，社会事业大部分由地方处理，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划为非生产建设，在基本建设项目中往往挂不上号，中心城市没有能力按经济规律要求运用计划调节来指导经济活动。财政体制也不合理。去年武汉市财政收入有十三亿七千多万元，但武汉本身财政支出只有三亿六千多万元，连维持现状都困难，谈不上发展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和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更谈不上从事什么具有战略性的建设。因此，要发展中心城市组织地区经济的作用，就要逐步改变这种体制。在国营企业

中，除去极少数有关全局的大型企业仍应由中央直接管理外，其余都应该下放给市管理。同时给予它在经济上以足够的权力，使它能够从事必要的城市建设和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能够打破条条块块的束缚，按经济要求搞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经济协作和联合，组织地区之间的合理经济网络。这样就应该对武汉这样的中心城市实行计划单列，把重要城市建设和产品列入国家计划。在财政体制上还要给武汉市以财政上的较大自主权，使它有充分经济实力来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在对经济贸易上也要有足够的自主权。象现在这样连一个小小的对外协议市长都不能拍板，还要请示上级才能决定，是不行的。

(四) 整顿工业，加速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工业基地的作用。武汉的工业潜力很大，但经济效益不高。主要原因除管理体制和流通体制上过分集中，政企不分而外，就是企业本身经营管理不善，技术设备更新改造困难以及“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等等，因此要加快企业整顿和改革的步伐。今后工业的发展，应主要是走内涵的道路，尽可能少采取外延扩大生产的办法。首先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改善经营管理和进行技术改造。武汉现在企业技术设备大多陈旧，需要更新。整改过程中，既要鼓励一定范围内的专业化协作和联合，又要允许一定程度的竞争。武汉洗衣机厂采取招标的办法处理外购外协件，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外购外协件的质量，增加了经济效益，破除了与协作单位共同吃“大锅饭”的局面，带动了协作单位加快整改的步伐，这种办法，值得提倡。

今后武汉工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1) 面向本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需要，给他们提供价廉物美适销对路的消费品。(2) 面向农村，和用农村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保证农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的需要。(3) 恢复传统名牌产品，开辟新的拳头产品，压缩长线产品，加强短线产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工艺品。(4) 加强环境保护建立新工业应以轻工业和对城市没有污染的工业为限。对城市有严重污染的化工和重型工业的建设，要离城区远一些。

(五) 沿江开辟带形新市区。武汉老区，如硚口、江汉、江岸一带已经饱和，发展潜力不大。今后武汉的城市规划，有个不成熟的设想，可否沿长江北岸从黄浦路到阳逻一带建立起一个带形的新工商业区，这个带形的新区可以分为两半：西半从黄浦路到岱家山一带是商业区，东部是轻工业区。商业区可以吸引外资和各省的投资把它建成象深圳那样的拥有高楼大厦和各种现代化设施，特别是电气化和电子计算机化的设备的内外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轻工业区主要是为新建项目提供厂址，因为靠近阳逻港，便于用水运装卸运输。重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可能导致城市污染的项目可以放在长江南岸从葛店到黄石一带，一则距市区较远，二则距离阳逻港较近，三则也接近大冶附近矿产资源。

(六) 面向农村、支援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有80%人口在农村，农村是我国最大的市场。武汉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地处江汉平原，并与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相近。内地各省，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非常丰富，两湖地区，更是粮棉产地，鱼米之乡，素有“两湖熟，天下足”之说。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村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少农民富裕起来，农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由于没有很好组织引导，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因为“两通”不畅，许多土特产品运不出来，造成积压，甚至腐烂。农村所需要的优良种子、化肥、农业器材和生活用品等也未得到满足。还有不少农、林、牧、副、渔和山区土特产品需要进一步开发，如湖北省的猕猴桃在国外久享盛名，但我们自己还没有足够重视。湖北省猕猴桃品种多，而且质量优良，年产四、五千万斤，但每年利用率仅十分之一。无核蜜桔，已经大面积培育，这是好事，如再加引导，在国际上可能成为拳头产品。湖北省的各种水果和瓜菜都有，但质量大多很差。应利用武汉的农业科技的力量，在改良品种和培育方法方面予以指导。木材和药材是山区的丰富资源，但木材有乱砍乱伐的现象，需要加强管理。山区药材品种很多，应大力开发，需要在中医药师的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湖北和内地可供出口的农副产品很多，如桐油、蘑菇、木耳、茶叶、猪鬃、兽皮、生丝、苧麻、药材等等，但品种规格和包装往往很差，不符国外市场要求。有些出口物品，如在包装上改善，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大大提高出售价格。这些单靠生产队自己是搞不好的，需要通过城市的专业协作或商农联合组织来解决。总之，要利用武汉工业、商业、科技、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商品流通，科技协作生产联合等途径和组织形式来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广大内地农村富裕了，城市工业和其他产业也会跟着发展起来。

(七) 开发江湖，发展水产。长江两岸湖泊星罗棋布，湖北省就有“千湖之省”之称。鱼类是人们喜爱的食物，营养价值很高。据说我省养鱼水面有314.5万亩。约占全国内陆可养鱼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一说

为748万亩，待考)。以一般民间饲养方法估计，单产至少每亩1000斤，如果全部产鱼，总产量可达31.45亿斤，即157.3万吨。如果改进饲料和养殖方式。当然远不止此。但过去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水产很不重视，以致1982年的实际产量仅为17万吨。所谓“鱼米之乡”，鱼竟少得可怜，当然水产不止鱼类这一种。1980年7月，胡耀邦同志视察湖北时指出：“农业上要注意水产，淡水养鱼希望你们成为全国带头的省，而且要创造一点新的经验。”童大林同志也指出要重视江湖的开发。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同志对此非常热心，提出要把省市水产科技力量组织起来，成立省市水产局、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结合的水产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水产发展规划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积极推广科研成果。前途将是大有可为的。

(八) 支持湖北，发展中等城市。武汉地处湖北，对湖北应作出更大贡献。除去上述对湖北农业和水产要大力支持外，还应协助培植省内中等城市成为有关地区的经济中心。湖北省具有中等规模的城市有黄石、宜昌、沙市、襄樊、十堰等。这些城市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科技力量方面都已具有一定规模。今后如果在工业技术设备，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信息等方面得到武汉的支持和协作，不难成为它们各自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它们的经济实力加强以后，将会大大促进全省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为华中地区的繁荣兴盛作出贡献。关于这方面，上海经济区正在进行规划，将来可以借鉴。我的设想是，将来华中经济区应以武汉为核心。黄石、宜昌、沙市、襄樊、十堰等市以其所依托的地区形成二级经济区，围绕在武汉周围、形成“众星拱月”之势。继而再扩大到附近其他各省的中等中心城市，将来形成一个“小太阳系”。这样，华中经济区的气势就更加磅礴了。

(九) 以武汉为金融中心建立地区的金融网络。经济的活动离不开物资的运动，也离不开货币的运动，它们常是相伴或交迭进行的。企事业的现金收付，转账结算，资金融通，异地汇划等都要通过银行进行。特别是商业，商品的买卖过程，就是商品与货币相互交换位置的过程。有商品交易，就有货币或信用票据的支付。因此金融中心常伴随着商业中心而出现。中心城市要发挥其对所在地区经济活动的组织引导作用，很大一部分要靠银行来进行。对经济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主要靠银行。要通过银行来吸收社会上闲散资金，调节地区的货币流通，控制信用的胀缩，便利资金的融通，促进资金的积累，提供灵通的经济信息，指引企业活动的方向，监督企业执行合同的情况和资金运用的效果等等。为此，在一个经济区也要建立起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中心和金融网络。我国现行的银行体系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农村信用社各有分工的银行体系。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工商信贷银行和储汇银行的三结合。这种体制不能适应今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中心和经济区的需要，似还有改革的必要。中国人民银行应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集中主要精力在货币的发行、宏观的金融管理以及货币流通与信用的调节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把工商信贷和储蓄汇兑的具体业务分出来，单独成立工商银行和储蓄银行来处理。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人民银行不宜多，全国有一个总行。每个大经济中心有一个分行就行了，但是工商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分支机构要多，凡是有工商业和居民集中的地方都该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视地区需要而设立，不宜过少，也不宜过多。今后所谓地区的金融中心和金融网络，就是由一个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若干个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和较多的工商银行以及众多的储蓄银行组成。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再详加论述。

(十) 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城市服务行业主要搞旅社饭馆、医疗卫生、垃圾处理、街道清洁、理发洗澡、保管包装、菜场商店、小商小贩、电影戏剧、文化宫、娱乐场、体育馆、运动场、各种修理行业、码头车站搬运等等，甚至市内邮电服务如市内交通(如出租汽车、公共汽车)也可包括在内。凡是非生产性，有益于城市居民生活的劳动，都算。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很不重视这些行业，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其实，这些都十分重要。这些事业搞不好，直接影响人民生活，也间接影响工作效率。发展服务行业至少有以下一些好处：(1)方便群众，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社会效益；(2)可以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3)所需要的投资少。资金周转快，收益大，可以加速资金积累，用于城市其它建设；(4)可以提高社会购买力，为工农业产品，特别是日用消费品开拓市场。人们到一个城市，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搞得好坏，对一个城市工作的评价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十一) 积极发展旅游事业。旅游事业是现代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自开放以来，旅游事业日益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接待游客就有四百四十多万，但他们很少到武汉来，主要原因是：(1)湖北地

区的旅游胜地没有加以开发，吸引力不大；(2) 国际机场没有修好，交通仍不很方便；(3) 武汉的对外旅客的服务设施不够好。今后，交通和服务事业有所改善，武汉成为国内外贸易中心以后，国内外旅客一定会增多；再修整和多辟一些游览胜地，一定会使旅游事业兴旺起来。武汉地区的风景名胜不少，但有的需要修整，如归元寺、宝通寺等，有的需要宣传，如辛亥革命纪念馆、农民运动讲习所、磨山植物园等，有的需要扩建和重建，如东湖风景区、黄鹤楼、晴川阁等。湖北地区也有不少名胜古迹，如三峡风光、葛州坝的水利枢纽工程、宜昌的三游洞、荆州的古城古墓、当阳的玉泉寺、襄阳的隆中、鄂西北的武当山、咸宁的温泉、鄂豫边界的避暑胜地鸡公山和麻城的龟山等。这些名胜古迹，加以修饰扩充，必能吸引不少游客。专来武汉市的游客不用说，即使到湖北省其他各地游览的旅客也必须以武汉为中转地或驻地。同时，还可把武汉市变为华中地区土特产和外销的手工艺品的中心，以便旅客购买。这样可以吸收一大笔外汇，为进一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创造条件。

(十二) 组织科技和教育的力量，加强智力同生产和权力的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作风。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却长期造成理论与实际脱离，领导与群众脱离，权力与智力脱离的局面。导致在经济上出现不少政策失误。大量的智力储备，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科技是生产力。现代化的生产主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推动。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科学技术现代化如果不同农业、工业、国防结合起来，也实现不了其他三个现代化，现在的党中央和各级部门非常重视这种结合。前面谈过，武汉市的智力基础是很雄厚的。但过去没有很好利用。现在市的领导很重视这一点。武汉市已经成立了咨询委员会。动员科技与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来为政府的重大决策进行研究并提供咨询意见。武汉市已与清华大学、华中工学院和武汉大学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协作项目达37项，这种作法正在推广。可以想见，定会收到丰硕成果。今后还要利用武汉市的科技和教育力量为湖北和其他各省的经济发展服务。使武汉市成为华中地区。甚至“九省”地区的科技、教育、咨询以及管理服务的中心。这样，武汉市作为中心城市的作用就更大了。